



“这个字万不能改”

梦溪

我国当代著名的杂文家吴晗，不仅文笔尖锐泼辣，而且性格刚直不阿，真可谓“文如其人。”

早在四十年代，那时的吴晗已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战士，素有“老虎”之称，与“狮子”之称的闻一多齐名，使国民党望而生畏。

1941年，当时重庆“国立编译馆”约吴晗写一部《明史》，稿子送上去后，国民党当局作了审查，不久，稿子被退回了，稿子上随附了一张字条，内容是：“红军之起，拟改为‘民军之起’，以下一律照改，方能发表。”

吴晗看了非常气愤，当即回绝：“第一是因为国民党怕共产党领导的红军，连将近六百年前的红军都怕，怕得好，就让你一直怕下去，我宁可不出书，这个字万不能改；第二，如上所说，‘民军’在当时是地主阶级所组织的武装队伍，专和红

军作对的军队的称号，红军改成‘民军’，恰好把两个敌对的军队颠倒过来了，红军变成地主军队了（地主军队变成红军了一编者加），这真是岂有此理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”

就这样，《明史》一直被搁置，直至解放后，才见天日。



刊头设计 董凤山 本版编辑 杨乾坤



止敬

马术，骑术也。它是我国传统的一种马上竞技运动。《六韬》一书载有选拔能骑射的武士之法。汉以后骑术成为百戏节目之一。建国后，马术运动成为体育比赛项目，这些项目在少数民族地区十分活跃。马球，三国时称“击鞠”，骑在马上持棍击球的一种运动。从曹植《名都篇》中“连翩击鞠壤”的诗句看，这项运动最迟在东汉已经产生了。自高祖李渊起的22个皇帝（包括武则天）中，大多数都爱好马球运动。唐代女子也喜爱马球运动，五代后蜀花蕊夫人词：“自教官娥学打球，玉鞍初跨柳腰柔。上棚应是官家认，遍遍长赢第一筹。”元代流行的长途赛马活动叫“诈马”，成吉思汗曾制定诈马制度，每年一次，参加者穿着官服，手执带铃彩杖，勒马竞速。

哈萨克民族以套马作为一项体育活动，套马需要迅速准确的甩索技术，高超的骑术和强壮有力的

体格。鄂温克族牧民从小要学套马技术。套马用的坐骑是选出的好马，称“杆子马”，它不一定能跑得快，只要聪明、机警、善于体察人意，服从指挥就行。

赛马是蒙古族一种古老的竞技游艺活动，既是比马的耐力和速度，也是比骑手的马术和胆量。比赛大抵有两种，一是“赛跑马”，马快速奔跑，以先到终点为胜，二是“压走马”，比赛稳与快，所赛的不是大跑，而是前后蹄交错的“小跑”，要求整个过程不能“失腿”。

有趣的是，哈萨克族有“新人赛马”的婚礼风俗，新郎新娘穿戴一新，马头、马尾结扎彩带，参加婚礼的人也骑在马上准备跟随新郎新娘赛马，观看逗人的美景。新娘坐骑若追上新郎坐骑，新娘便用马鞭抽打新郎，新郎不得还手。满族将“跳马”列为体育运动项目，“跳马”要在马飞跑时横跃上马身，这个动作——在早期是为了和敌人短兵相接时，便于飞上敌骑的擒拿技术。广西融水苗族有“斗马”的杂艺活动。两马相斗，败者落荒而逃，胜者披红挂彩。

卓越的制陶工艺

张文立

制陶工艺是伴随我们民族时间最长的手工艺之一。不过，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陶质生产生活用品及工艺品。秦代手工业工匠继承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制陶经验和技能，把制陶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。秦陵出土文物便充分展示了这一点。

秦陵的建筑材料砖和瓦，质地细腻、坚硬，敲起来当啷作响，声音清脆，可以作砚台，自古以来便有“秦砖汉瓦”之称，被许多文物收藏家所爱好。这一点，将来再介绍。这里着重谈一下秦陵陶俑的制作。

秦陵陶俑陶马大体有三种：一种是陵西出土的管理珍兽的陶俑，一种是陵东马厩坑出土的跟坐俑，一种是名震中外的兵马俑。这些陶俑陶马有共同的特点：形体高大，造型逼真，栩栩如生。参观过的人对它们的制作都表示惊叹，不由追问：这些俑、马是怎样制出来的？

考古工作者经过对陶俑、陶马的认真研究，终于找到了答案。它的制法可以用几句话概括：选土和泥苦用力，塑模结合制陶俑，分件制作再套合，入窑烧后彩绘成。具体来讲便是，各地的工匠艺人选好陶土，将土合成泥，反复揉踩，作成泥条。作俑时，选用泥条从下肢开始盘塑，直至躯干。用模子作成头、手、耳等大样，把塑制

要经过一次绘彩。脸、手为粉红色，衣服、铠甲为红、桔红、紫、绿、白、黑、蓝等色。装彩前，还要涂一层胶质底色，保持颜色不掉。经过两千多年的地下生活，陶俑脸上、身上的颜色大部剥落，但还有不少俑、马身上还保留着颜色，至今鲜艳夺目。

这样大的陶俑、陶马，装窑烧制很不容易，不小心便会因内部热气膨胀而破裂。当时的工匠聪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他们在俑、马身上都留了一个圆形的出气孔。因此，陶俑、陶马虽经900—1200℃的高温烧炼，没有破裂，而火候均匀，烧得很透，没有出现夹生的，敲起来声音铿锵作金石响。说它不容易；可用现代人仿制原大陶俑作比较。现代制原大陶俑的，没有一家不是经过多次试烧才成功的，且有相当一批陶质疏松。而陶马迄今还未烧成。相形之下，秦代那些工匠费了多少思索，经历了多少失败，甚至有人为此牺牲，便可使人想见的。

近翻元明史料笔记丛刊《谷山笔尘》，读到这样一件事：嘉兴人许应逵，在山东东平做太守时，为政廉洁，奉公守法，但为同事所妒忌、中伤，上司调他到别处任职。临行时，“吏民走送，哭泣不绝”。许应逵行至客舍歇息时，对众人说：“为吏无所有，只落得百姓几眼泪耳。”从人打趣道：“阿爷囊中不着一钱，好将眼泪包去做人事、送亲友。”许应逵一笑置之。

按现在的级别论，许应逵应为地师职，但离任时并无多少钱物，只落得群众的几许眼泪。说他傻吗？非也。其实群众的眼泪比钱财珍贵得多。从古至今，群众爱清官、恨赃官。清官离任、调职时，群众挥泪送别的事，古籍中屡有所见。眼泪虽然不能当钱使，但却是群众对他们为政清廉的褒奖，是群众对他们莫大的信任，这是用金钱买不来的。今天，地方官员调职离任时，群众洒泪惜别的事不多了。这并不意

眼泪的价值

尤金山

味我们的地方官就没有为群众办好事。我们的干部队伍中，不少人在位时廉洁奉公，离任时两袖清风。他们只求问心无愧，并不奢望群众的感激和热泪。对这些干部，群众是忘不了他们的，会记住他们的。但是，也不能否认，有些干部确实存在着为群众所不满的作风。他们把权势和钱财，看得比群众的利益重要。报纸上揭露的某些干部利用职权，侵害党和群众的利益，贪污受贿的案例，就是明证。他们失掉了党性，失掉了人心，失掉了群众，是很不应该的。

愿我们的干部能从“吏民走送，哭泣不绝”的许应逵身上受到教益和启发，廉洁奉公，克勤克俭，做一个群众喜爱而不是厌恶的好干部。调动或离任时，虽不图群众挥泪送别，至少不要让群众指着脊梁骨骂。

北京的一次更名

蒲德生

1949年9月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定都北平，并将北平改名北京。北京是我国有名的古都之一。北京一名早自明永乐（公元1403年）起已相沿580年。北京为何要在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改名北平？这是因为1927年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政变后，随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。8月19日，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通电宣布迁都南京，这就是史称之“宁汉合流”。次年4月，蒋介石在英、美支持下发动反奉战争。6月3日，奉军放弃北京，退回关外，张作霖在途经皇姑屯时被日军炸死。为了提防残余军阀东山再起时在北京再设政府，6月20日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：将直隶省改名河北省，北京市改名北平市，以北平、天津为特别市。

迎元旦

翁玉枝

九十年代第一春，神州万木露华滋。
一扫六害二扫黄，狠抓教育细如丝。
着意图新志不改，延安精神岂过时？
五中甘露催花发，四化宏图夺锦期。

和模制结合起来。然后揉用刻、削、刮、贴等方法，处理细部。如刻出眼睛、抬头纹，贴上胡须状泥片，然后再用小刀刻出胡须。用竹片或木片刮削出衣纹。这些完成后，再将手、头用躯干装在一起，一个活脱脱的陶俑、陶马便制成了。晾干以后，再入窑烧成。出窑以后还要经过一次绘彩。脸、手为粉红色，衣服、铠甲为红、桔红、紫、绿、白、黑、蓝等色。装彩前，还要涂一层胶质底色，保持颜色不掉。经过两千多年的地下生活，陶俑脸上、身上的颜色大部剥落，但还有不少俑、马身上还保留着颜色，至今鲜艳夺目。

“揭榜”
乾隆年某月日，正在客店小憩的王杰，听到同伴的咸声，忙到午门外看榜。

当他瘦小的身子从一伙山东举子肘下朝过挤时，一山东举子，一把抓住他问：“你是哪里人？在此乱挤？”王杰回答：“陕西人！”“陕西人？！”那人在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不屑地说：“你们陕西人，若能中在榜尾，就算给祖宗脸上争光了，你小子有啥能耐，在榜头乱瞅。”王杰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老兄，话不要说得太绝了，你看，榜上的头名状元王杰，就是我呀！”这句话，惊动众举子，他们都

王杰看榜

金升

把眼光投向王杰，只见王杰衣不华丽，貌不惊人，便从内心怀疑他究竟有无真才实学。一个举子说：“看你这等模样，不象个状元。我们出个对联，当面考考你。你若对上，便罢；若对不上，休怪我们要参倒你这状元了。”王杰说：“行，请出上联！”

山东人以炫耀山东名声的口气，出了上联：“泰岱三观，孔子圣，孟子贤，自古文章传鲁。”

王杰听了，微微一笑，以夸奖陕西的口气对道：“岐山一脉，文王谟，武王烈，而今道统在西秦。”

山东举子听了，无不以内心佩服王杰学问高深。



云乃山之魂

张广欣